

孫中山身體力行“湯武征伐” 與“堯舜禪讓”兩種革命新論

兼評析當今流行的“革命不如改良”、“告別革命”等說

譚世寶*

值此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筆者撫今追昔，感慨繫之。尤其鑒於當今學者對“革命”一詞之眾說紛紜，有不少人認為“革命不如改良”。特別是李澤厚、劉再復於1995年發表“告別革命”的談話錄後，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改良道路”與“辛亥革命”兩者作了一褒一貶的選擇性評判，引起了很大爭議。其書自1995年至2004年在香港已經出了五版。此外還在1999年由麥田出版社出了臺灣版，後來又在韓國漢城出版了韓文版。因此在海內外文壇具有相當的市場影響。⁽¹⁾雖然有關問題已經爭論了這麼多年，而“革命不如改良”之論仍然時有所見，造成一定的誤導和繼續引起關注與爭論。⁽²⁾筆者認為，“革命不如改良”、“告別革命”等說的理論錯誤主要是，既完全脫離了中國古典有關“革命”一詞的原意及其歷史實際，又完全脫離了孫中山所宣導繼承和實行的中國“革命”一詞的歷史傳統的原意及實際，還完全脫離了古典馬克思主義有關“革命”一詞的原意及其歷史實際。因此，欲要糾正其誤，必須先作正本清源之工作。在此基礎上，才能兼除末流之混亂。故此不揣淺陋，特撰此一小文，敬請方家賜教。

孫中山在近代宣導復興的古典“革命”原意

留美的著名政治學者鄒讜先生完全贊同“告別革命”的宣導者之一李澤厚先生的“告別現代”，“回歸古典”的理論。⁽³⁾但是，他卻完全忽略了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所要告別的“革命”，既非孫中山所宣導繼承和實行的中國古典“革命”的思想與實際，也非當代中國某派最新主張的片面而極端特殊的血腥暴力“革命”

之實際，因為這些革命都早已經成為過去了的歷史。過去了的歷史是既成的事實存在，是不可改變的。從其成為過去的革命的那個時候起，人們在實際上已經與之告別了，根本不必也不能在現在或將來才與之進行告別。因此，在“革命”事過境遷很多年之後，他們才提出要告別的“革命”，實際祇是現代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極左“革命派”主張的片面而極端特殊血腥暴力的“革命”思想觀念在其頭腦中的殘餘。但是，這種缺乏自知之明的“告別革命”論者或附和者，都把孫中山所宣導繼承和實行的

*譚世寶，歷史學博士、語言學博士，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歷史研究所客座教授、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中國古典“革命”理論與最新的特殊的血腥暴力“革命”理論混為一談，因而才會提出或認同對“革命”作全面徹底的告別。

請看辛亥革命元老馮自由在著名的《革命逸史》中記述“‘革命’二字之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詞。及乙未九月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鄭弼臣三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三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英文 Revolution 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之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⁴⁾

由此可見，孫中山志存高遠，繼往開來，復古創新，在中國近代史上首先正確詮釋了“革命”一詞的原意。雖然孫中山是受日本人將英文 Revolution 譯為漢語的“革命”，並以此稱其領導的黨人之啟發。但其所確定“革命”之真義，已經超越 Revolution 而回歸儒家古典的“革命”之本義，其要點在於“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由於“革命”是“應天順人”之舉，所以即使使用武力，也是死人甚少。正如《孟子·盡心下》反對《尚書·武成》有關形容“周武伐紂”的革命之舉為死人甚多的“血之流杵”的殘酷戰爭之說，指出：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接着還進一步指出革命戰爭之所以稱為“征”，就是大家都按照正義來正己之身體行為，所以各地方國的人民都爭先恐後地期盼和迎接正義之師來解救他們，故正義之師所向無敵，所謂“有征無戰”，就是最高的革命境界，不戰而屈強敵，使之內亂崩潰投降，基本不用暴力戰爭就能瓦解敵軍敵國，取得偉大的成功勝利。其文如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按：“陳”為“陣”的假借]，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按：“兩”為“輛”的假借]，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公孫丑下》還根據人心之順逆向背指出：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按：“畔”為“叛”的假借]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然而，“湯武革命”祇是儒家宣導的革命之一種形式，而非唯一的普遍形式。其最高的境界是不用武力的“堯舜禪讓”。這也是孫中山最為推崇的革命之最佳方式和最高境界。故此，後來在“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麼？”孫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⁵⁾堯舜是和平革命的典範，湯武是用有限武力革命的典範，孔子則是歷代聖王的文武革命之道的集大成總結傳播者。率先以“革命黨”自命的孫中山，其所發動的辛亥革命的確是全面繼承發揚

光大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古典革命正統，交替運用了文武之道的方式。因此，他才能對自己的革命思想基礎作出上述的總結。孫中山亦以此成為超古邁今的開創中國現代革命的先驅偉人，這是絕大多數現代中國人乃至真正關心和瞭解中國革命的外國正義之士都非常肯定的。

就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全過程而言，其形式是以極少犧牲的極小規模武力戰爭加大規模的和平協商之“禪讓”，結果是初步達到了用中華民國取代清朝帝國。結束自秦至清兩千多年帝制的偉大勝利。請看孫中山策動一連串失敗的武力起義中犧牲人數最多、影響人心最大的一次，就是有七十二烈士的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起義。⁽⁶⁾ 在有了這接連十次的犧牲甚少的起義失敗奠基之後，到辛亥年八月十九日（陽曆亦即歐美天主教基督教國家通行的耶元1911年10月10日）之夜由極少數革命黨人在武昌發動的起義，由於深得民心，得到原來的立憲改良派乃至守舊派的支持響應，故能一舉成功，也沒有犧牲多少人。此外，就是在攻佔南京時有過戰鬥，其它南方及西北方約半個中國的各地反正獨立的革命都是聞風而起即獲成功。革命形勢發展非常迅猛，結果除北京之外，只剩下奉天、吉林、黑龍江、甘肅（寧夏、蘭州）以及河南為清朝殘餘勢力北洋軍閥等掌控。在此有利形勢下，最後通過南北各方各派的迅速有效的和平談判與協商，決定了辛亥革命在全國和平成功的結果，至1912年2月13日清帝正式宣佈退位，同日孫中山亦按照事先的協議，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並推薦袁世凱以自代而終結。

孫中山身體力行“湯武”與“堯舜”兩種天下為公的革命

中國“革命”的古典意義，就是“革命”的性質在理論上具有“應天順人”的正義性。“革命”的形式，據其實際進行的情況可以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以單純的和平禪讓方式達到帝位轉移或朝代改換的革命，其典範是儒家經典記述遠古傳說的堯舜禪讓故事。在中古時期以“禪讓”名義作帝位轉讓、朝代更替之例甚多，最早有西元9年1月14日-15日，王莽以“禪讓”方式取代漢朝建立新朝，建新年號為“始建國”，推行復古改制之新政，史稱“王莽改制”。魏晉南北朝多有權臣以“禪讓”方式進行改朝換代。至唐朝自高祖、太宗開始有父子之間的帝位轉讓，史稱“內禪”；後來有武則天以異姓母取子位兼改朝的“外禪”方式宣佈改唐朝為周朝，降唐睿宗為皇嗣，自為皇帝，史稱“武周革命”。⁽⁷⁾ 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到了五代末期，則有趙匡胤兵不血刃的“黃袍加身”，“以杯酒釋兵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以宋代後周，結束唐末五代的軍閥割據專權的亂局之革命，並使之呈現出陳寅恪所說的中國古代文化登峰造極的盛世。

第二種是以極有限而小規模以及死人甚少的武力戰爭實現革命的成功，其典範是儒家經典記述上古的商湯伐夏桀、周武伐商紂的革命故事。其在後世之例有秦末陳勝、吳廣發動的亡秦農民大起義以及劉邦率師迅速佔領咸陽的亡秦之舉；隋末農民大起義達成的亡隋結果；元末農民大起義達成的亡元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叛）”。

第三種是前兩種的結合。辛亥革命是屬於第三種。歷史事實表明，孫中山領導的反清反封建帝制的革命，是始於效法湯武征戰的局部地方的小規模武力起義，而終於效法堯舜禪讓的全國和平演變與改良，從而達至辛亥革命的成功。孫中山以辛亥革命的勝利實踐，證明其“知難行易”的理論對革命發展的準確預見。因為孫中山早在1906年駁斥改良派的反革命所謂孫中山搞“大革命後四萬萬人必殘其半，及主張以大流血以達此目的等語”之說純屬偽造，其揭露梁啟超以“彼書生之見，以為革命必以屠殺人民為第一要著，故以其所夢想者而相誣”。再作表白說：“以余之意，則中國民族主義日明，人心之反正者日多，昔為我敵，今為我友，革命軍之興必無極強之抵力。”⁽⁸⁾ 由此可見，當今流行的一些貶“革

命”而褒“改良”之論（詳見下文），實屬當年早已破產的梁氏“書生之見”。

由於孫中山早已立志實行儒家倡行的“天下為公”之制度，故在辛亥革命的最後關頭能夠審時度勢，成功運用中國傳統的“堯舜禪讓”理論，說服革命黨內外各方（包括立憲派、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投機派、清朝帝室的識時務的明哲保身派等等）同行“堯舜禪讓”之舉，使得“革命”以最和平的方式達到成功。在其本人經各省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會後，在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誓詞中已經表明其要帶頭實行“禪讓”。其誓詞如下：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⁹⁾

次日在〈覆袁世凱電〉文中，孫中山再次明確表示祇要袁世凱為和平完成民國代清的革命立功，則保證退位讓賢於袁世凱。其文如下：

袁慰庭君鑒：鹽電悉。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俱在，區區此心，天日鑒之。若以文為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孫文叩。⁽¹⁰⁾

其後在1月5日給袁世凱部下的〈勸告北軍將士宣言書〉重申：“（……）一俟民國〔國民〕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¹¹⁾至1月14日〈覆直豫諮議局電〉更加全面清楚地說：

直隸諮議局、河南諮議局鑒：由汪兆銘轉來電稱：“貴局往復籌商……擬提出三條件：

一、清帝退位後，能否舉袁為大總統？二、共和成立，接管清政府所有北方軍隊，能否不追既往，與南軍一律待遇？三、優待皇室及旗民生機，能否先行議定？”云云。昨經電汪兆銘，以所開三條件，臨時政府早已宣佈此意，自屬能行，令轉覆貴局矣。⁽¹²⁾

根據新近發現的1912年1月31日《申報》所載，孫中山在1912年1月給河南諮議局議長方幹周的電報有如下之說：

兩宮以堯舜為心，不但軍民愛戴，即全國人民及各友邦亦必同情愛戴，則皇室親貴之永久尊榮，自能千古優待（……）民軍所不惜犧牲一切，欲成共和者，目的在改革政治，造福同胞，免受瓜分慘禍，若能早日成功，本總統自應即讓賢者（……）⁽¹³⁾

按照前述有關電文約在四五日後見報之例，估計此一電報約在1月26日發出。由於中國有“堯舜禪讓”的悠久革命傳統思想深入人心，孫中山能夠在革命進行到成敗膠着的十分複雜而關鍵的時刻，大公無私地主動提出上述可以獲得各方認同的“堯舜禪讓”方案。這一方案的成功之處首先在於順應了人心對和平革命的渴望。其次是利用了袁世凱個人求取大總統之位的慾望。再有就是利用了清朝帝室祈求保存性命與富貴以及體面下臺的心願。由始至終，袁世凱都在保障其能謀取個人及北洋軍閥集團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與孫中山主導的“堯舜禪讓”方案有密切的商討而積極互動配合。

例如，1月16日，袁世凱等（全體國務大臣）上折密奏勸告皇太后及皇上從速接受孫中山代表民軍提出的“堯舜禪讓”的“民主”制度，以免重蹈法國王室亡國滅族之禍說：

（……）臣等受命於危急之秋，誠不料國事敗壞一至於此也。環球各國，不外君主、民主兩端，民主如堯舜禪讓，乃察民心之所歸，迥非歷代亡國之可比。我朝繼續承承，尊

重帝系，然師法孔孟，以為百王之則，是民重君輕，聖賢業已垂法守。且民軍亦不欲以改民主，減皇室之尊榮。況東西友邦，因此戰禍，貿易之損失，已非淺鮮，而尚從事調停者，以我祇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爭持，則難免不無干涉，而民軍亦必因此對於朝廷，感情益惡。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府鑒大勢，以順民心。⁽¹⁴⁾

同時，袁世凱還暗中策劃北洋將領以前線倒戈率師北上進京威脅清室立即同意“禪讓”。1月26日，袁世凱的主力愛將段祺瑞領銜與北洋將領共五十人聯名要求清帝下詔退位並實行共和。⁽¹⁵⁾其後又在2月5日正在率軍北上的段祺瑞又領銜與北洋將領王占元等合共九人聯名發出威脅清室的通牒電報說：

第一軍總統段祺瑞等，以共和詔旨遲不發，以親貴之中，尚有反對者，於是致王公大臣電云：“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內閣各府、部、院大臣鈞鑒：共和國體，原以致君堯舜，拯民水火，乃因一二王公，迭次阻撓，以致恩旨不頒，萬民受困(……)乃並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瑞等不忍字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鑒之。”⁽¹⁶⁾

在內外各方之威逼利誘之下，隆裕太后最終同意接受優惠清室的“禪讓”，交權給袁世凱於2月13日宣佈清帝“遜位”，其文說：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

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¹⁷⁾

由此可見，假如中國沒有“天下為公”、“堯舜禪讓”等古老的民主革命傳統思想深入人心，則孫中山不可能在革命進行到成敗膠着的關鍵時刻，大公無私地主動提出上述可以獲得各方認同的“堯舜禪讓”方案。由於這一方案的迅速而順利實行，讓位的雙方包括孫中山與隆裕太后都享有“堯舜”之譽。例如，民國開國元勳徐紹楨當年的日記有記載說：

大局初定，袁世凱欲得總統，孫中山遂讓之。余見中山譽之曰：“君以天下讓，此中國三千餘年所未有者也。”中山曰：“吾但見歐美國民主國，每屆選舉總統，各出競之術，舉國若狂，殆非盛德之有。使中國永無此爭競總統之事，豈不美哉？”余聞此言，中心服之。(……)嘗為粵民言此事，亦無不以為堯舜再見也。⁽¹⁸⁾

還有史料表明，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身份第一次來北京在社會各界歡迎大會的演說中，便曾公開“贊隆裕太后贊成共和，交出皇權，可以稱之為‘女中堯舜’”。而且在隆裕太后去世時，民國各地軍政要員，也紛紛向清室發來唁電。副總統黎元洪唁電稱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堯舜”。山西都督閻錫山唁電稱：“皇太后賢明淑慎，洞達時機，垂憫蒼生，主持遜位。視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國民哀悼會的發起者吳景濂發表公啟說：“隆裕太后以堯舜禪讓之心，贊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國帝運之末，開東亞民主之基。順天應人，超今邁古。僉謂美利堅之獨立，受戰禍者或七八年；法蘭西之革命，演慘劇者將數十載，雖伸民氣，實苦生靈。前清隆裕皇太后，默審潮流，深鑒大勢，見機獨早，宸斷無疑。詔書一下，化干戈為壇坫，合五族為一家，大道為公，紛爭立解。蓋寧可以弊屣天下，斷不忍塗炭生民，所謂能以私讓國。”並倡言於3月19日在太和殿開全國國民哀悼大會。⁽¹⁹⁾

孫中山逝世之後，追悼偉人的挽聯成千上萬，筆者獨以孔祥熙所獻再挽之作的“唐虞湯武，合冶一爐”之句最為簡潔貼切而先得我心。特引其聯如下：

唐虞湯武，合冶一爐，至彌留時，猶為同胞呼速起；

松柏葛蘿，忝聯十載，於痛定後，更從群眾哭先生。⁽²⁰⁾

國民黨耆宿劉揆一追悼孫中山的二百五十六字長聯也有同類之意，現再引其聯文如下：

天心太不仁矣，胡喪斯空前絕後之完人！揖讓邁堯，征誅踵武，辯才優於鄒孟，博愛廣於墨翟，平等真於釋迦。數千年專制權威，純賴苦衷改革，旗張白日，初因雷鄉；血染黃花，再挫南越。論到援寧救鄂，策劃尤艱。光復漢山河，巍巍元首，弊屣尊榮。豈期約法無靈，群雄多僭名割據。珠江天師府，揮淚興師，利鈍非所知，惟有鞠躬盡瘁死；

國運亦奚衰乎！誰竟此三民五權之主義？克強早逝，松坡公亡，項城深負公托，黃陂徒有公心，河間直與公敵。二萬里共和樂土，漸成滿目瘡痍。神聖勞工，疇為主宰；職業政治，痛失導師。記得行易知難，學說不朽。陶熔新社會，眷眷同盟，仔肩責任。自愧壯懷虛抱，昔時曾受命陪危。行館讀遺書，服膺垂誡，精誠永相感，何容世亂苟全生。⁽²¹⁾

此聯“揖讓邁堯，征誅踵武”之句，也是認為孫中山的革命功德是綜合了堯舜的揖讓與湯武的征誅而超越之。

總而言之，當時的國人普遍公認孫中山與隆裕太后實踐了“堯舜禪讓”，雖然前者是主動的倡行者，後者是被動的接受者，但都是以和平的方式放棄了個人最高的權力，使人民避免了戰爭的劫難而達到政治革命的目標。因此是值得讚頌的。

對《告別革命》的“革命留下的後遺症”之說評析

當然，由於完全無視上述辛亥革命的“革命”理論的古典原意及其在現實的具體實踐的歷史實際情況，而且把和辛亥革命截然不同並且早已被“告別”的末流某派獨具特色的“革命”理論和實踐與之混為一談，《告別革命》就不免有如下厚誣革命先驅，歸咎辛亥革命的對話：

李（澤厚）：我們祇是“告別”革命，並不是簡單地反對或否定過去的革命。因為像革命這樣重要的、複雜的歷史事件和問題，持簡單的肯定或否定態度都是不妥當的。以往是簡單的肯定，凡是革命的都好，所以我們才講革命帶來的負面作用，我們反對或否定是過去那種對革命的無條件的盲目崇拜和歌頌。但這不是說，革命包括辛亥革命祇有負面價值，也不是說革命在任何時期都缺少理由。……今天對現實經濟體制不滿，想要革命的情緒仍然存在，所以我們才覺得應該總結本世紀的經驗來“告別”革命，指出連那個萬口稱頌、少有異詞的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未必必要，它帶來了許多負面價值；從而指出歷史可以有另一種選擇（改良道路）的可能性。……

劉（再復）：革命留下的後遺症實在太大。在二十世紀，從辛亥革命開始，儘管都有當時的客觀原因和根據，但是，到了今天我們作反省的時候，完全有理由認為不一定必然要選擇革命的方法。因為暴力革命總是流血，而流血的結果總是再流血或留下血的大陰影。包括1949年以後，我們為甚麼還不斷地搞政治運動？為甚麼不停地搞革命大批判？為甚麼崇拜火藥味很濃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為甚麼那麼脆弱？這就是革命陰影的影響。革命通過大規模流血的方法奪取一個政權，奪取了政權自然是勝利，但是勝利以後作為勝利者的心裡總是有一種陰影，即害怕那些被打倒的階級用同樣辦法“復辟”。⁽²²⁾

對於因撰寫於壯年而出版於“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的一些美學及中國思想史的著作，曾領風騷數年的李澤厚先生，晚年竟然作出如此文不對題，概念混淆、邏輯混亂的談話錄，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故有必要對之略作評析。

首先，其談話錄的書名《告別革命》，究竟其作者與其所要“告別”的“革命”是甚麼關係，才有必要而且能夠與之“告別”呢？筆者認為，正如某人是在某個組織、群體中或與之有近距離關係之人，才能與之告別。如果他們現在既不是其所謂“革命”中之人，又不是與其所謂“革命”仍處於親密接觸的關係，那麼其所謂“告別革命”真不知從何而說。

其次，有時他們實際上已經很清楚並且承認其所要“告別”的“革命”，並非現在還存在的“革命”，而祇是“過去的革命”，或更具體而準確地說，祇是告別“過去的革命”所遺留給他們的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妨再引其文如下：

劉（再復）：我們的對話是在新舊世紀之交中進行的。當歷史就要跨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所作的告別，其意義在於，我們不要帶着20世紀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即革命的包袱跨入新世紀之門。⁽²³⁾

由此可見，他們所要告別的，祇是他們自己一直在其思想中所“帶着20世紀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至於在其說出此話的當時或現在究竟有多少人與他們一樣，在思想上同樣“帶着20世紀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呢？筆者認為，即使有，也不多。祇要他們都能逐漸覺悟，真正把這樣的思想包袱丟掉，那就好了。姑且相信有一些人因為讀了《告別革命》而丟掉了這“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那麼現在還帶着這個包袱的人肯定減就少了一些。

現在最為滑稽的情況是，像李澤厚、劉再復在遠離祖國多年之後，經過如此沉痛的遲暮反省中才知道要把自己思想中“20世紀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丟掉的人，竟然以為大多數中國人都比他們後知後覺，還在背着同樣“一個

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因而擺出以先知覺後知，先覺後覺的架勢，不厭其煩地一再發文出書大談所謂“告別革命”，“苦口婆心”地勸人丟掉這“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真是令人非常詫異兼且心情沉重。曾經風騷多年的思想導師，孰令至此？

正如《告別革命》曾記錄李澤厚的話，指出代表中共領導改革新潮流的鄧小平早在他們之前已經放下了毛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的不斷“革命”包袱，其文如下：

（……）其實，1995年十月發表的關於“1995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這一頗為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便似乎通篇未見“革命”二字，這在毛的時代實屬不可思議。這文件當是鄧所關注並最後點頭的，可見，鄧早已告別革命了（……）⁽²⁴⁾

由此可見，當今的中國早已經沒有《告別革命》所要告別的那種“革命”，所以根本不存在與實際的“革命”作告別的情況。至於與那種“革命”殘餘的思想觀念或包袱的告別問題，就連曾經參加和領導過那種“革命”的鄧小平都已經被他們稱為“早已告別革命了”。那麼，還需要與那種“革命”殘餘的思想觀念或包袱的告別的中國人，除了李澤厚、劉再復這樣遠離神州，浪跡海外天涯多年的理論家之外，還有甚麼人和多少人，不是可想而知嗎？特別是在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弦易轍，開放改革，成功實行了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接軌的當今中國，建設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理論普遍流行的情況下，繼續對之喋喋不休地鼓吹如此文不對題，概念混淆、邏輯混亂的“告別革命”，借此對早已經和陶淵明一樣“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²⁵⁾的大多數國人作訓導，享之以過去了的某派最新而獨特殘酷的“革命”殘餘的思想包袱之沉重痛苦，懼之以未來可能會發生的這種“革命”復辟之極端恐怖，可以說是完全脫離實際而令我輩莫名其妙之論。須知，隨着世代的自然更替，雖然

現在可能還有堅持“帶着20世紀一個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的極少數人，但是最後也必然要全部告別這個世界。隨着既無“文化大革命”這個中國最近一次的所謂“革命”的經歷，又無這一“革命”殘餘觀念包袱的80後、90後人主導的時代來臨，《告別革命》之類的論著影響必將逐漸消亡，這應是不言而喻的。

對當今流行的貶“革命”而褒“改良”之說評析

如前所引《告別革命》之文排斥和貶責辛亥革命之類型的“革命”，而同時選擇和褒揚所謂“改良道路”，其理由主要是“因為暴力革命總是流血，而流血的結果總是再流血或留下血的大陰影”。因此該書“指出連那個萬口稱頌、少有異詞的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未必必要，它帶來了許多負面價值；從而指出歷史可以有另一種選擇（改良道路）的可能性”。此說之誤首先是誤把辛亥革命看作單純的暴力流血革命，或者說成是由祇懂得單純用暴力流血手段的革命黨人來進行的革命。其次與此相應的，就是其所肯定的“改良道路”可以單純用非暴力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政治改革。

當然，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在內地文壇也有一定的市場。例如，最近黃振迪先生批評有人與李澤厚一樣以哲學學者的身份來談論歷史所犯的同類錯誤，指出：

（……）這一年很幸運地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於是，關於辛亥革命的文章蜂起。本來，對歷史進行解讀，從來就沒有統一的標準，有不同的解讀很正常。但是，袁偉時教授以哲學學者的身份，卻又以歷史學者的面目出現，不遺餘力地貶辛亥革命、貶孫中山，具有很大的誤導性。

他對袁偉時教授的貶“革命”而褒“改良”之論的具體批評如下：

“革命、改良”——在袁教授大量的文章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給的答案是，改良好。我們先來理一下頭緒。我同樣也是認為改良好。革命是破壞，是砸爛舊機器，重新來過；而改良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來搭建屋，社會成本自然就低得多。而且，對於社會來說，其積累的物質與精神財富更是無法計量——這本就不是問題。

在這裡，我引一下雷頤先生的文章，在其〈從歷史性思維看辛亥革命何以發生〉中說：“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激進”的代名詞，頗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立憲”被辛亥革命“打斷”而深感遺憾。不經革命的大動盪大破壞而收革命之實效，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作為一種良好的願望，更是無可指責。但若強以近代中國的歷史來為之佐證，指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過激”，則有違史實大矣。康、梁想通過“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過激”？其實，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的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上書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線的。祇是在“改良”被拒之後，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²⁶⁾

筆者認為，黃振迪先生的批評基本正確。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商鞅變法、王莽改制等等都是以和平改良的方式開幕，然後逐步以改良派和反改良派的文武鬥爭展開，最後以流血犧牲的結局告終。至清代康梁發起的戊戌變法同樣是以和平方式開場，以六君子為代表的流血犧牲失敗告終，證明“改良道路”也有暴力流血的風險。而且改良派曾企圖用先下手為強的突然襲擊扭轉弱勢，由譚嗣同傳光緒皇帝的密旨策動袁世凱在天津搞武裝政變，以求一舉制服慈禧太后為首的反對派。這充分說明改良派也不是祇會單純用和平手段的。在此之後，改良派唐才常等人於1900年奉康有為之命策劃自立軍起義，遭到清朝湖廣總督張之洞的破壞鎮壓，唐才常等二十多人被捕殺害。受此一失敗而被株連有關人員親族，前後

捕殺達千人。⁽²⁷⁾可見在辛亥武昌起義之前，改良派被清朝殺害者，不見得比狹義的“革命派”少，甚至可以說是更多。

至於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以武力起義始，以和平禪讓終，首先是因為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是對孔子儒家的古典革命理論在近現代的繼承發揚光大。故此，後來在“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麼？”孫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²⁸⁾堯、舜、禹是和平革命的典範，湯、武是用有限武力革命的典範，孔子則是歷代聖王的文武革命之道的集大成總結傳播者。故此，以發揚光大古典正統革命為己任的孫中山，其所發動的辛亥革命是文武之道並行的。孫中山亦因此成為開創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先驅偉人，這是絕大多數現代中國人乃至真正關心和瞭解中國革命的外國正義之士都非常肯定的。因此，企圖貶低或否定孫中山及其發動的革命，祇能如韓愈詩歌所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²⁹⁾

其次，是因為參加辛亥革命的既有孫中山的革命黨，也有原本搞和平改良的立憲派。兩派都懂得交替使用武力與和平兩手。孫中山本人不但在青年初出道時有過上書李鴻章等官員的改良派行為，而且在早期的革命中與失敗落難改良派有過合作，而且在倫敦蒙難時就一度自稱為和平改良主義者以博取英國人的同情救助。⁽³⁰⁾足見其在革命的方式和策略上具有天才的靈活性，自始便含有暴力起義與和平改良這兩面。兵凶戰危，兵者，不祥之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中國歷代政治家、軍事家皆明此理。故能夠使用非暴力或少暴力的方式達致革命的目標，這是大家都願意的。故民國成立第五日，就用英文發表〈對外宣言書〉明確說：“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輕啟戰爭。”⁽³¹⁾西方的古典馬克思主義也是主張作如此的選擇。例如，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就曾經指出：“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

法廢除私有制？答：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³²⁾

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演講中指出進行辛亥革命的兩派：“一面是同盟會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為；一面是各省諮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願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群眾運動。這樣子鬧了好幾年，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產，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機會湊巧，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合運動。武昌一聲炮響，各省諮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佔舖產的掌櫃，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托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³³⁾

綜上所述，可知“革命派”與“改良派”並沒有截然的分界和始終的對立，兩者從個人和整體的思想行為都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可以互相轉化，互相配合的。故此兩派在辛亥革命中展現了“同歸而殊塗(途)，一致而百慮”⁽³⁴⁾的盛況，合力造成了局部的小規模武力征伐加全國性大規模的和平嬗變的革命結果。由此可見，《告別革命》等論著貶斥辛亥革命而褒揚“改良道路”的理據完全錯誤。

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孫中山的革命理論與實踐，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峰。儘管其當時已經是最先進大量地吸收了歐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精華的革命思想家與實行家，但是正如其後來向馬林及世人所表白的：“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回到革命的古典和原點，就可以清楚看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其所要肯定和發揚光大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革命之道與方式，都是一脈相承的亦文亦武的仁義之舉。辛亥革命開始是運用“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的小規模武力獲取巨大成功之起義征伐；其後是通過大量文

質彬彬的談判協商，請客吃飯，杯酒釋兵；最後運用的是非常得民心的溫文爾雅的傳統仁義道德和平宣傳攻勢，以歌功頌德，流芳千古的禪讓儀式來完成。因此，所有把“和平改良”排除於“革命”之外，從而褒“改良”以貶“革命”之論，都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誤說，必須商榷清楚。

2011年6月13日
草撰於澳門理工學院
6月23日改定

【註】

- (1)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尤其是該書的劉再復“第五版前言”），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五版。章開沅：〈無法告別革命〉，見辛亥革命網2011年5月17日 來源：《瞭望》。
- (2) 見 <http://www.xinhai.org/yanjiu/191102887.htm> 所載2011年3月22日張客正：《青史憑誰判是非——革命與改良的爭論》。
- (3) 見同上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所載鄒謙〈革命與“告別革命”——給〈告別革命〉作者的一封信〉。
- (4) 見馮自由：《革命逸史》(2)，引自 <http://www.du8.com/books/nov2707.shtml>。
- (5) 引自 <http://www.xinhai.org/yanjiu/191101127.htm> 所載鄭起東：〈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 (6) 1932年，確查本次起義犧牲人數實為86人，參見〈黃花崗起義與越南華僑〉，載 <http://blog.boxun.com/hero/nanshanxis/5-1shtml>。
- (7) 參考 <http://www.hx1sw.com/History/shuitang/gs/2006/0920/969.html>。
- (8) 參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2頁〈與胡漢民的談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9) 引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頁〈臨時大總統誓詞〉，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10) 引自同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頁〈覆袁世凱電〉。
- (11) 引自同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頁〈勸告北軍將士宣言書〉。
- (12) 引自同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0頁〈覆直豫諮議局電〉。
- (13) 見李伯新：《孫中山史料輯錄》第35-36頁，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14) 見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9-300頁所載〈以內閣合詞奏委恫挾袁太后〉，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
- (15) 見同上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4-306頁所載〈段祺瑞等自前敵電請退位〉。原電文前語稱致電者為“段祺瑞等四十二人”，當今有關論著多用此數。最近也有人稱此次通電聯名者共47人，見 <http://www.xhgmw.org/archive-53842-2.shtml> 所載2011年5月12日 來源：新京報 作者：姜妍：〈段祺瑞：通電共和，南北做媒〉。今據電文末署名的將領實際人數共有五十人。
- (16) 見同上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6-307頁所載〈段祺瑞致電王公催發共和詔旨〉。
- (17) 見同上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15頁所載〈清帝退位〉。
- (18) 轉引自吳慶孟主編：《政海拾零》，頁98，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
- (19) 見 <http://www.jingrao.com/minsu/2221.html> 所載〈中國末代皇太后隆裕的大喪〉。
- (20) 見 <http://bbs.xhgmw.org/viewthread.php?tid=158> 所載〈孫中山先生挽聯精選〉。
- (21) 見同上。
- (22) 見〈階級協調和階級鬥爭〉——再論《告別革命》之二，原文發表於1996年7月30日香港《明報》，後載於同上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第250-253頁。
- (23) 見同上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第251頁。
- (24) 見同上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第249頁。
- (25) 見遼欽立校註：《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0頁。
- (26) 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33135.shtml> 所載 2011-3-26 10:41:00 發表的黃振迪：〈袁偉時教授對孫中山評價過於敷（譚按：“敷”應為“膚”）淺可笑〉。
- (27) 參考 <http://jds.cass.cn/Article/20060216103604.asp> 所載〈自立會和自立軍〉。而據美國《紐約時報》當時的報道，是次被張之洞屠殺的自立軍人士多達誤1,500人。轉引自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頁361-363，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
- (28) 引自 <http://www.xinhai.org/yanjiu/191101127.htm> 所載鄭起東：〈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 (29) 引自 <http://www.yuwen123.com/Article /200508/ 8724.html> 所載陳永正：《韓愈〈調張籍〉詩歌鑒賞》。
- (30) 參見同上《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頁〈倫敦被難記〉注①。
- (31) 引自同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頁〈對外宣言書〉。
-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39頁。
- (33) 見何廣：〈歷史上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和解讀〉，來源：《北京日報》，引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965606.html>。
- (34) 見（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冊3288頁，1959年。